

专题：中国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改革与新世纪国际秩序的重塑

何亚非

内容提要：新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全球治理。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消长，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亟须改革和调整。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共识和基本合作，目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地缘政治的干扰依然困扰着全球治理及其改革进程。

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对全球治理负有重要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从全球治理的全新视野观察、分析世界事务，并参照制定、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杭州峰会，各国的目光聚焦中国，不仅希望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更希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重塑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国外交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全球治理 国际秩序重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大国共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竞争、处理相互关系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规范和平台，对重塑国际秩序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性、系统性风险积聚，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环境恶化有增无减，反全球化、反“现有架构”（Establishment）的民粹主义力量上升。全球治理体系在战后有效运转70多年之后，“治理无序”和“碎片化”严重，需要从机制体制上进行彻底改革，以适应国际关系深刻演变与国际秩序重塑的世纪挑战。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危机此起彼伏，各国都在思考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问题，关注如何在大国合作而非“零和”争夺的基

何亚非 原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

础上，有效调整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推进新世纪国际秩序有序重塑，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争取更长时间。

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国际秩序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中国是在现有体系内发展壮大起来的，但体系中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近年来暴露无遗，需要通过改革以适应国际力量变化的现实。中国不结盟，不赞成“赢者通吃”和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网络，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编织形式多样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全球伙伴关系思想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同盟网络完全不同，有利于为全球治理改革和国际秩序重塑创造条件。中国已经与70多个国家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全球伙伴关系思想，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和欢迎。

世界已经不再分“东西南北”，在解决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时，往往不是简单以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划线，而是根据现实利益进行临时组合（Ad Hoc）。然而，一旦涉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秩序重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争夺与博弈就难以避免。

中国主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是近十几年的事，其中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其标志是二十国集团（G20）替代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加五国（G7/G8+5）成为处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

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明显感到作为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遇到重大挫折和考验的关键时刻需要发挥引领作用。这不仅为中国自己，更是为了整个世界。这种深深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从来没有那么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仿佛舞台强光聚焦中国，举手投足，处处受到关注。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提出并积极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成就时，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正在向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全球性大国的物力、财力、人力，以及源自中华文明的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Commons）。这次转折中国有思想、有行动，主动作为，水到渠成，表明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其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效应。这也是各国对中国2016年主持召开G20峰会颇为期待的主因。

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而世界未来也将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全球治理直接关系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国在新世纪对全球治理的思想认识明显深化，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开始运用中国思想来“牵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对国际秩序重塑产生影响。这体现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前瞻性、战略性思考，与中国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对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等全球治理难题，中国 and 世界各国一样都有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从知之不多到深入了解，从参与不深到积极引领。这

与中国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对世界命运共同体认识日益透彻有关联。由于西方长期把持全球治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绝非“纯洁无瑕”，在不少问题上依然

**中国现在有足够
的制度、道路、理论、
实践自信从容应对全
球治理的种种难题。**

或明或暗埋有“钉子”。然而，中国发展壮大不可阻挡，已成历史潮流，中国现在有足够的制度、道路、理论、实践自信从容应对全球治理的种种难题。

2015 年至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是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已接近8%，居第三位，维和经费更多，超过10%，居第二；二是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的改革方案终于得以落实；四是中国倡导建立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都已投入运营。其中一些举措并不是轻而易举实现的，而是经过很多反复和曲折，最后不仅许多欧洲国家积极支持、加入，连美国也不得不予以认可。最近，美国财政部长在《外交》杂志撰文《美国与全球经济》，专门谈及美国的态度。

全球治理从根本上来讲是基于国际规则和综合国力的“相互治理”。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并取得长足进展，不仅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同步，而且恰逢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原有体制机制、规则模式暴露重大缺陷，无法适应全球化形势发展和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治理逐步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治”转变，与国际秩序重塑进程提速相互叠加，进入历史过渡期和转换期。

就中国而言，这个过渡期的特征是从世界（西方）治理中国向中国（参与）治理世界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是国际秩序重塑向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它也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治理领域中发生的这些转折性变化牵涉全球化进程利益的重新分配，将使中国在国际格局的分量更重，决策权和话语权增大；大国关系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

当前，全球治理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全球性难题接踵而来，集中爆发；二是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形势变化，呈现“无序”和“碎片化”状态，改革迫在眉睫；三是受地缘政治影响，大国对全球治理合作意愿不强，缺乏稳定的合作框架。全球化迅猛发展带来战后长期和平与繁荣，也带来空前的全球挑战和难题。世界正站在“反全球化”和“再全球化”博弈加剧的十字路口。

2013年，世界银行原副行长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在其《分隔的国家》¹一书中列举了21世纪人类面临金融、网络、流行病、移民和气候变化等五大挑

¹ Ian Golden, *Divided Nations: Why Global Governance Is Fai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战。当然，全球性挑战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扩散、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全球性挑战本身。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自的难题，关键在于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办法，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有希望通过修改旧规则、制定新规则，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使之适应形势变化。在国际事务中，通常意义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往往是主权国家和其他国际事务参与者（Players）就不同问题，依照利益不同，构成不同组合或者“阵营”。如何改革全球治理，使国际秩序重塑向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该如何指导中国参与和引领这一进程呢？

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略作分析和探讨。

一、大国共识与合作构成全球治理的基础

全球治理涵盖国际事务各个领域，是制定国际规则、监督执行规则、奖惩执行结果的国际机制性安排，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形成以大国共识为基础的“全球共识”。

因为没有“世界政府”，最接近“全球共识”的是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巩固和加强联合国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取得这一共识的基础。《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主权国家平等原则、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等规定都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同时也凸现形成共识的困难。考虑到联合国在全球治理的有效性方面有所欠缺，全球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像 G20 这样的“指导委员会”的引领作用，以凝聚主要大国和国际上各利益组合的共识。当然，G20 与联合国关系需要处理妥当，否则会出现“合法性”问题。中小国家可能因为没有参与和“拥有感”（Ownership）而质疑或者不支持 G20 决定，即便这些决定本身符合各国的利益。2009 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 20 多个大国和联合国及其他区域组织在小范围达成的《哥本哈根协定》持抵制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多年以来，全球治理的历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诸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但是在瞬息万变的全球治理过渡期，要形成全球性共识往往依赖全球危机的强刺激。譬如，地区 and 世界金融危机、伊朗和朝鲜半岛核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化难题等。然而，一旦危机缓和，“好了伤疤忘了疼”，利益组合体之间、大国之间的共识就难以持续，问题便搁置起来，久拖不决。

从大国政治的视野来加以分析，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挑战，第一要素是形成并巩固大国解决问题的共识和政治意愿，其中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尤为关键。

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挑战，中美两国的合作尤为关键。

以全球金融体系为例。当今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是美国和美元主导的体系，

漏洞百出，但是要改革却步履维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弱势，话语权、决策权匮乏，与日益上升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

2015年中国GDP增长6.9%，经济总量近11万亿美元，人均约8000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目前依然高达3.2万亿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实现小康，GDP将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当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汇率计算占全球总额的23%，中国为14%。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为16%，中国加香港是17%。而纵观全球金融体系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美元圈”（指美国和其他货币多少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占世界人口和GDP比例都在60%左右。全球化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效果并不同步。发展中国家GDP已占全球40%以上，但美元体系并未随之变化。“美国特殊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十分突出。目前，华尔街投资银行占全球市场半壁江山，美国各种基金管理着全球55%的资产。

归纳起来，美元体系有三方面问题引起许多国家不满：

一是单一美元体系无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因对美长期有货物贸易顺差而被指责为全球经济失衡“肇事者”。目前，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欧元区，德国、北欧贸易顺差国与南欧逆差国严重对立。

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与收紧、弱美元与强美元周而复始，致使全球美元资金流动性时而过大，时而紧缩。美元资金大进大出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也极大。2015年下半年以来美元走强已影响到巴西、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导致这些国家资金外流，货币贬值，财政状况堪忧。

三是美元体系内存在不公正、不平等、不平衡问题。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放弃美元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成为依靠美国政府信誉的纸币，但依然是世界主要结算、支付、投资和储备货币。1999年欧元诞生，迄今因欧盟一体化进展不顺、欧元区债务危机缠身而一路贬值，甚至有“散伙之虞”。日元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便一蹶不振。英镑基本稳定，但也是“边缘”货币。人民币近年发展势头好，国际化进展顺利，截至2015年8月底升至世界结算货币第四位，但总量不大，只占2.79%。

为确保全球金融稳定，需要对美元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美元“身兼两职”，而美国货币政策并非由各国决定。为确保全球金融稳定，需要对美元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是，美国的反对使大国对改革难以形成共识，“这块奶酪”动不得。

世界经济失衡、资本无序流动、广泛美元依赖症从美元体系建立以来就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美元体系出问题的“序幕”。世界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可是做起来不容易，需要稳步推进，因为这

涉及全球化利益再分配，在大国之间达成共识困难很大。

大国达成共识、团结协作战胜全球挑战的最佳例子是，G20升格为峰会，头两年成功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和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进行了紧密合作，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资金盘子、确立 G20 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加强对全球系统性影响银行的监管等方面，推动 G20 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世界金融体系也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可喜变化。而最近几年 G20 再次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局面，其主要原因正是大国间共识减少了，考虑各自利益多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2016年中国主办 G20 峰会，各国希望中国和美国等其他 G20 成员能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共识、付诸行动，原因也在于此。

二、中国与全球治理关系密切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要全面、深入思考全球治理问题，重新定位全球治理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地位，及时调整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政策和路径。

中国早已不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已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中国内外政策有强大的“外溢效应”或“外部性”（Externality），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这是不争的事实。2015/2016年中国股市和汇率变化触发全球股市和汇市波动，证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密切的联动效应。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密切关联和快速联动是国际关系的新现象。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需要从全球治理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参照来制定、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

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有睿智的描述：即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两个“新”字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处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全球治理领域的新定位、新思路：新在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新在世界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

各国最关心两件事，一是安全，二是经济，两者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全球治理的核心也在于此。

国家安全取决于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成功。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主要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相对平衡或“均势”是相互关系稳定的基础，否则便谈不上全球安全治理。

中国在新世纪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全球伙伴关系，包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着眼于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大国关系

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中美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中美合作与摩擦并存，合作是主流，但部分矛盾激化。从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视野来分析中美关系起伏跌宕，不难看出，主要是美国在适应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在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问题上摇摆不定，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历史潮流，美国作为守成霸权大国需要适应变化，顺应历史潮流，在对外政策上做出调整。

长期以来，美国的调适主要表现为合作加“对冲”(Hedging)的“两手政策”，希望通过接触与合作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框架，借全球化推动中国国内政治向美国靠拢，也就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

美国两手政策的前一部分客观上与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内发展的思路大体重叠。同时，中国希望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不公平的内容，这些改革主张与美国维护领导地位和既得利益有矛盾。美国认为全球化给了中国发展赶超美国的时间与空间，“焦虑感”增强，亟须修改“游戏规则”。

同时，美国一直想在“政治上改造”中国，希望中国变成另一个美国。正如王缉思教授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与国际秩序》一文中所说，“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核心是中美之争。中美关系的焦点，是中国力图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和美国力图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¹这种战略认知偏差使美对华政策始终左右摇摆，近年因中国持续发展而趋于强硬，在合作的同时更偏重于制约和“再平衡”(Rebalancing)，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特别在南海捍卫主权的正当行为疑虑重重，甚至反应过激。

美国内对华政策辩论核心纠结于“两手政策”如何平衡。中国快速发展、影响力日益扩大，使美国的“焦虑”心结加重。这不仅反映在美国处理双边关系，更反映在全球治理方面。

美国作为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主导方，本应在全球治理中给中国相应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不是本能地“反对”中国任何涉及全球治理的倡议。美国对待人民币(RMB)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及在建立AIIB问题上，从一开始反对到后来不得不改变态度，就是这一心态的反映。霸权国家要心平气和地对待新兴大国并非易事，出现偏差在所难免，关键是适时调整，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美对华政策近年“摇摆”幅度增大，有时下滑幅度之大，令人担心。

在世界近代史上，守成霸权国调适过程常常是痛苦的，最终做出“对抗和冲

1 王缉思：《“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与国际秩序》，《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突”的错误选择也不在少数。如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交织、经济上相互依存，加上现代化武器毁灭性打击能力，选择军事对抗代价太大，可能性越来越小。然而，选择错误不可能完全排除。中美是否有智慧和能力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各国十分关注。

两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中美之间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希望两国关系能和平、稳定发展，但要把双方高层承诺外化于两国关系具体行动尚需时日。近期美国在南海以航行自由为由肆意进入中国主权所属岛礁附近海域和上空，炫耀武力，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综合实力包括军力发展的反应过激的表现。

2016年初，中美就朝鲜新一轮核试验在各自首都和纽约进行磋商，最终就安理会新决议达成一致，内容既包括制裁，也敦促谈判，比较平衡。朝鲜半岛核问题既涉及中美、中朝、中韩关系，也与全球安全治理即维护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密切相关，需要中美相互理解和紧密合作。

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着眼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走和平相处、合作共赢道路，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局观和全球观，可以说是抓住了两国关系的“牛鼻子”。

中国与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中等强国，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以及与印尼、尼日利亚、土耳其、阿根廷等重要地区大国的关系近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外交的靓丽风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加强大国合作、共同治理世界的新思路和新贡献，其核心主张依然是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2016年初，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沙特、埃及和伊朗三国凸现了这一外交新思想。习主席在阿盟的演讲中强调，中国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新时代呼吁新国际合作模式，摒弃“零和”思维方式，各国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外交需要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更加重视全球治理领域的创新。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设想把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圈经过数条宏大的“经济走廊”与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形成跨区域、跨领域、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中国就全球治理提出的全新思路，着眼于重塑国际秩序，为新世纪世界和平繁荣奠定基础。

中国关于新国际合作模式和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的大逻辑、大思路已引起沿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浓厚兴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东盟进入自贸区“钻石十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模式等“一带一路”沿线形式多样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

中国需要以全球主义情怀加强国际事务的统筹协调。

全球治理已渗入国际关系方方面面，与中国处理多双边事务紧密相联，理应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深入研究全球治理，以全球主义情怀加强国际事务的统筹协调。当今国际关系内容和主体的多元化与全球治理已深入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思考和制定对外战略时要兼顾双边关系与全球治理中各种复杂利益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治理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这场危机结束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使全球治理进入“混乱无序”状态。它昭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药方”破产，旧有发展模式耗尽潜能，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思路、新模式，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较量在新世纪拉开帷幕。而中国持续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虽不能照搬照抄，却是可供借鉴、难得的成功治理经验。

新的历史条件赋予中国新的大国使命。世界不仅希望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更赋予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重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历史性机遇和空前挑战。

中国外交可以借鉴 G20 发展轨迹进行创新和拓展。

2008年底 G20 首次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峰会，主要经济体协力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2009年匹茨堡峰会顺应历史潮流作出决定，由 G20 替代 G8/G7+5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全球治理出现历史性变化。中国在政治安全上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不扩散条约》法定的核武器国家，至此在经济上成为 G20 核心成员，全面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2009年4月初的伦敦峰会上又是中国领头承诺出资 500 亿美元购买 IMF 债券，为扩充 IMF 救助资金盘子、提振世界经济信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 G20 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中国 2016年 G20 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以致力于推动全球创新增长方式，完善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实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G20 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世界对中国举办 G20 峰会寄予厚望，希望中国凝聚 G20 人心，重振世界经济，继续改革全球治理体系。

如何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是 G20 成员和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方面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外交今后需要把全球治理作为制定政策的大背景和大框架。

推动主要国家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全球化使各国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G20 可考虑建立有职有权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加强金融、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协调，赋予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

长机制真正的协调功能；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政策要增强透明度，多考虑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避免负面“溢出效应”。

在寻找新增长动力方面，在保持总需求稳定的同时，供给侧改革和调整显得更为重要，以提供更多合适、对路产品，吸引消费者，开拓新市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要紧密配合。

新增长动力来自创新发展，来自新一轮工业革命。创新是经济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与产业革命两方面。推动创新驱动、打造新增长源、尽快实现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同时坚持改革不适合创新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适应、引领新常态的新路径，也可以成为G20经济增长新动力来源。

三、全球治理改革任务艰巨

全球治理改革的任务很重，面临许多困难。要使世界经济发展步入稳定轨道，并重新塑造能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需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以适应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需要。G20作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可以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重新塑造能兼顾
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
需要对全球治理体系
进行系统性改革。

一是改革IMF、世行和WTO为支撑的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把这些机构与G20直接挂钩并执行G20的决定，以从机制上使G20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得以有效执行、令行禁止。

二是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世界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并非发展中国家之错，而是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缺陷，原有发展模式潜力业已消退。需要改革创新，寻求新的增长模式、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中国愿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提供新思路与新动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仅仅着眼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消化过剩产能，而是希望通过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区域和跨区域发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通过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资金积累，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作贡献，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倡导多边合作或双边合作新模式，确立一批“一带一路”项目，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丝路基金资金为“药引子”，带动国家和民营资本与沿线国家合作搞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进行互补互利的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可以嵌入G20峰会政策性建议，将构建中国经济开放新格局与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深度力度持续加大，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步开放。这种相互开放的新格局将促进全球合作伙伴更广泛合作，做大共同利

益的“蛋糕”。

三是对美元货币体系进行“增量”改革和“存量”调整。一要推动世界货币体系多元化。美元还会是主要储备货币，但除了欧元、英镑、日元外，人民币、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巴西里亚尔等货币份额应提高；二要推动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多元化，人民币、卢布等可逐步成为定价货币；三要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丝路基金、清迈倡议货币安排等新型区域和跨区域金融机构和安排逐步成长，使国际金融体系和融资系统更多元、更富生命力；四要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拥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与美国协商，对海外美元资金池的安全做出合理安排，以减少美联储政策“外溢”效应。同时确保各国在美国的美元资产安全。美国财政部债券60%约6.2万亿美元现在外国手里。

四是理顺世界经济运行结构，整合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特别是自贸区安排。自由贸易是促进世界经济的核心，现在世界上有450个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协定，各种区域和跨区域自贸安排五花八门，会相互“踩脚”，需要整合或者协调。

例如，《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涉及投资环境和条件，与各国国内政策关联性强。但这两个协定由于地缘政治原因都刻意排挤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不利于世界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和东盟等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涉及世界30%GDP，可望于2016年完成。两者不妨可以相互协商、整合。G20和联合国可就此作些尝试。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有所作为。

总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与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紧密相关，全球治理须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要转变观念，努力创新，改变过去就单一领域治理谈全球治理的做法，形成系统性、全局性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

时不我待，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是时代的要求。有三点是肯定的：一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二是中国外交中全球治理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三是中国外交亟需大批精通国际规则、精于国际谈判的人才。